

曹操传

他是难得一见的，有热情、有魄力，有创意的政治改革家，又是位敢于亲自上前线，冒险挑战的军事家，更是位杰出的兵法家、文学家和诗人，堪称文武全才。

GAO GAO

一代枭雄魏武帝

全面、详尽地描述了他对中国历史作出的卓越贡献，也描述了他为人谲诈的一面。

本书以他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为主线

何国松◎主编



曹操

CAO CAO

一代雄主 武王



中国历史人物传记丛书

中国历史人物传记丛书

卷一

曹操传

GAO GAO



何国松◎主编

◎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曹操传/何国松主编.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5601-5117-5

I. ①曹… II. ①何… III. ①曹操(155~220) —传
记 IV. ①K827=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5050 号

书 名: 曹操传

作 者: 何国松

责任编辑: 王世林

责任校对: 王世林

封面设计: 创品牌

出版发行: 吉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长春市明德路 421 号

邮 编: 130021

发行部电话: 0431-88499826

网 址: <http://www.jlup.com.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印 刷: 三河市冠宏印刷装订厂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2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 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1-5117-5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曹操（公元155～220年），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三国时期魏国的实际建立者。在政治军事方面，他鞍马劳顿，倥偬军旅数十年。平袁术，擒吕布，消灭袁绍父子，收降张鲁，战马超，北讨乌桓，南击孙权，西战刘备，统一了中国北方大部分区域，并实行一系列政策恢复经济生产和社会秩序，奠定了曹魏立国的基础。在文学方面，在曹操父子的推动下形成了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史称“建安风骨”，他的诗以慷慨悲壮见称，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他是难得一见的，有热情、有魄力，又有创意的政治改革家，又是位敢于亲自上前线，冒险挑战的军事家，更是位杰出的兵法家、文学家和诗人，堪称文武全才。本书以他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为主线，全面、详尽地描述了他对中国历史作出的卓越贡献，也描述了他为人谲诈的一面。

本书笔调清新，雅俗共赏，是中国历史人物传记创作上的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当然，本书并非一本历史学著作，因此，我们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根据行文和读者的需要，合理、大胆地进行了合乎文学规律的再创作和艺术加工，以期给读者带来最大的精神享受和阅读享受。

由于学识所限，加之时间仓促，本书的不当之处自是难免，诚望各位读者提出宝贵意见，在此先予致谢。

目 录

第一章	时代背景	(1)
第二章	少年曹操	(15)
第三章	走入仕途	(30)
第四章	挟天子以令诸侯	(52)
第五章	东讨袁术	(68)
第六章	驱伐吕布	(72)
第七章	打败头敌	(83)
第八章	北方初定	(113)
第九章	经营北方	(130)
第十章	赤壁兵败	(152)
第十一章	定关中	(165)
第十二章	占领汉中	(172)
第十三章	曹操之死	(176)
第十四章	还原曹操	(181)
第十五章	曹操之谜	(225)
第十六章	千秋评说	(241)
第十七章	曹操智谋赏鉴与运用	(253)
附 录		(282)

第一章 时代背景

曹操字孟德，又名吉利，小名阿瞒。在介绍东汉末期这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之前，我们有必要把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作一简要的说明。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人是时代的产物。

一、帝国的危机

两汉帝国的主要危机是什么呢？主要是由春秋战国以来，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导致土地的集中化拥有，经济的衰颓，流民的大量出现，等现象来构成的。

春秋以来，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农业、手工业分工后，生产能力普遍提高，商品经济获得发展，土地买卖更加盛行。小农经济的不稳固性，必然引起有向高利贷者借款的必要，于是抵押土地，因欠债而转让土地和农民破产流亡等现象，开始增多起来，所谓“秦为无道……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汉书·王莽传》），“至秦……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书·食货志上》引董仲舒语），“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债）”（《汉书·食货志上》），正是这些现象的最好说明。

在两汉帝国的整个时期，大土地占有者——贵族官僚和商人，他们霸占了任何一个平民有权租人的公有土地。如西汉时，红阳侯王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垦草田数百顷，颇有民所假少府陂泽，略皆开发”（《汉书·孙宝传》）。哀帝时，“诏书罢苑，而以赐（董）贤二千余顷”（《汉书·王嘉传》）。此外，大土地占有者又不择手段地夺取农民的土地，如西汉宣



曹操传

CAOCAOZHUAN

帝时，阴子方“暴至巨富，田有七百余顷”（《后汉书·阴识列传》）。成帝时，张禹“买田至四百顷”（《汉书·张禹传》）。樊重“广开田土三百余顷”（《后汉书·樊宏列传》）。东汉时，济南王刘康有“私田八百顷”（《后汉书·济南安王康传》）。郑泰有田至四百顷（《后汉书·郑泰列传》）。中常侍侯览“前后请夺人……田百一十八顷”（《后汉书·宦者列传·侯览传》）。董卓表陈宦官张让等罪失，亦称“京畿诸郡数百万膏腴美田，皆属让等”（《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注引《典略》）。大土地占有者的发展，是在无数小农失去土地的方式下进行的。



两汉的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也向农村猖獗地进攻，最后集中于地权。造成东汉之末荀悦《除田租论》所谓“今豪民占地，或至数百千顷，富过王侯”、仲长统《昌言·理乱篇》所谓“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的景况，社会贫富对立的危机愈发深重。

小生产者——农民和手工业者在货币商品关系之后，在大土地占有者土地集中的过程之中，在两汉政府对外战争的捐税沉重负担之下，迅速地

破产了。他们因债务累累而丧失了自己的土地，他们虽是“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无）日休息。……勤苦如此”（《汉书·食货志》），但是还是无法谋生。而且有时还因为有了土地反要肩负整个战争重担和巨额租税，因此，自己甚至主动地抛弃了土地。从西汉武帝以来，一直到东汉帝国最后灭亡为止，农民从农村中被抛掷出来的问题，成为当时社会最严重的问题。

二、农民的流亡与起义

从战国时期土地可以买卖开始，就出现了流民，如《吕氏春秋·离俗览·高义篇》里所称的“宾萌”，即客民，也就是抛弃自己土地的流民。到了汉代，武帝元封四年（前107）“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报者四十万”（《汉书·石奋传》）。征和二年（前91）的诏文中，又有因官吏“兴美田以利子弟宾客，……下吏妄赋，百姓流亡”（《汉书·刘屈氂传》）的说法。昭帝始元四年（前83）的诏文中，又有“比岁不登，民匮于食，流庸未尽还”（《汉书·昭帝纪》）之语。宣帝地节三年（前67）诏文中，称“胶东相成，劳来不怠，流民自占八万余口”（《汉书·宣帝纪》）。“元帝初即位（前48），谷贵民流”（《汉书·杜周传》附《孙缓传》）。“永光元年（前43），……郎有从东方来者，言民父子相弃”（《汉书·于定国传》）。二年诏文中，亦有“元元大困，流散道路”（《汉书·元帝纪》）之说。成帝鸿嘉四年（前17），“关东流冗者众，青、幽、冀（山东、河北等地）部尤剧”（《汉书·成帝纪》）。故谷永上书称：“饥馑仍臻，流散冗食，喂死于道，以百万数。”（《汉书·谷永传》）鲍宣亦称：“民流亡，去城郭，盗贼并起。……贫民菜食不厌，衣又穿空，父子夫妇不能相保。”（《汉书·鲍宣传》）哀帝即位初年（前6），在其策免丞相孔光文中，也有“百姓饥馑，父子分散，流离道路以十万数”（《汉书·孔光传》）诸语。到了王莽时代，流民人数更加增多，史称莽始建国三年（11），“内郡愁于征发，民弃城郭，流亡为盗贼，并州、平州尤甚”（《汉书·王莽传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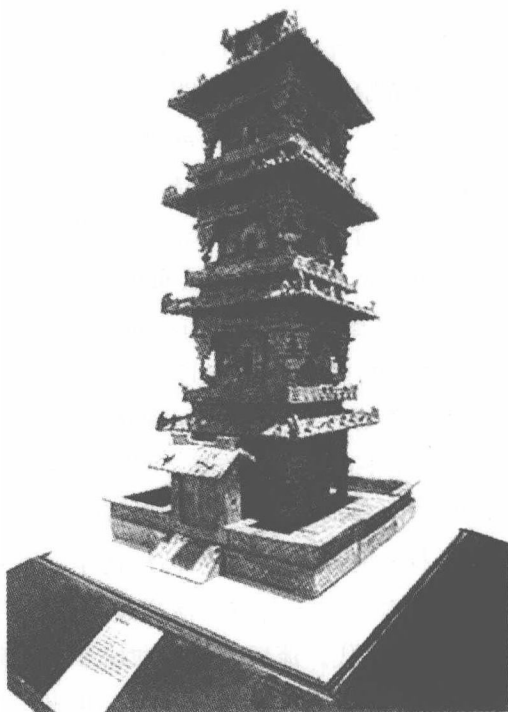
曹操传

CAOCAOZHUAN

莽之末年，“流民人关者，数十万人”（《汉书·食货志》）。

东汉的流民问题，从来就没有得到解决过。光武帝建武十三年（36），就因“米谷荒贵，民或流散”（《后汉书·光武帝纪》）。章帝建初元年（76）诏称：“比年牛多疾疫，垦田减少，谷价颇贵，人以流亡。”（《后汉书·章帝纪》）和帝永元五年（93），“遣使者……举实流冗（散），开仓赈禀”。永元六年，又诏“流民所过郡国”，加以赈济。永元十二年（100），诏“郡国流民，听入陂池渔采”。同年诏中又称：“比年不登，百姓虚匱，……黎民流离，困于道路。”（《后汉书·和帝纪》）永初二年（108），“时州郡大饥……老弱相弃道路”（《后汉书·安帝纪》李贤注引《古今注》）。永初四年（110），“三辅……人庶流冗”（《后汉书·安帝纪》）。又“青徐之人，流亡万数”（《后汉书·虞诩列传》）。顺帝永建六年（131）诏称：“连年灾潦，冀部尤甚……百姓……弃业，流亡不绝。”永和四年（139），“太原郡旱，民庶流冗”（《后汉书·顺帝纪》）。到了桓灵二帝时代，东汉帝国已濒于灭亡的绝境，流民人数更加增多。桓帝永兴元年（153），“百姓饥穷，流冗道路，至有数十万户，冀州尤甚”（《后汉书·桓帝纪》）。灵帝末年，“羌胡大扰，定襄、云中、五原、朔方、上郡等五郡，并流徙分散”（《晋书·地理志上》），更达到空前的程度。

这些农民，既被抛弃于农村之外，无可抗拒地要沦为“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汉书·食货志》）的境遇，要进入一种新的隶属关系，变成“部曲”和“佃客”。但是这种新的隶属关



系，又绝不是一朝一夕之所能建立起来的。在西汉末东汉初已经萌芽出的一种庄园，如马援在“北地牧畜，宾客多归附者，遂役属宾客数百家”（《后汉书·马援列传》）。及其屯田天水苑川，请与田户中分（《水经注·河水注》）。这种情况在当时还刚在发展，不可能更多地吸收被抛掷出来的农民，按照这种新的隶属关系投入生产还是刚刚开始，这就使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在社会上流荡。

没了土地而走上流亡道路的农民，他们的处境是极为悲惨的。《后汉书·刘平列传》里就有这样的记载：有一次，东汉帝国政府发遣王望任青州刺史，王望到任后，出外巡察，那几年，“州郡灾旱，百姓穷荒”，王望路上见到一群饥民，有五百多人，他们“裸行草食”，也就是说，他们赤裸着身体，啃着草根树皮，一路流荡。这种悲惨情况，是不能想像的。因此，东汉自安帝、顺帝时起，农民不断举兵起义，愈到帝国的末期，农民起义的声势愈加壮大起来。

东汉安帝（106—125）在位十九年中，大的农民起义一共发生了四次，顺帝（125—144）在位十八年中，大的农民起义一共发生了十次，冲质两帝一共在位不满二年，大的农民起义却发生了七次，桓帝（146—167）在位二十一年中，大的农民起义一共发生了十四次，灵帝（168—189）即位后一直到公元180年，农民起义一共发生了六次。以上还不过是有史可稽的，至于规模较小史书失载的农民起义，次数就难以计数，参加起义的人数也愈来愈多。在安帝顺帝时代，起义军不过几千人，到了桓帝灵帝时代，就多达数万人，甚至十余万人了。到了灵帝中平元年（184）以后，最终爆发了全国性的黄巾农民大起义。东汉末，农民起义地区，不仅在中原，西及益州，南至交趾。又从黄巾起义中分裂出无数细流，如黑山起义军、白波起义军等。而青州、徐州黄巾起义军，众过百万，黑山众亦过百万，白波众达数十万，这些规模巨大的起义，终于彻底地摧毁了东汉皇朝，实际上是这股社会力量结束了东汉的统治。

参加起义的基本群众是流民，这从黄巾军起义后杨赐上书朝廷，有“切敕刺史二千石，简别流人，各获归故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后汉书·杨震列传》）等语中，可以获得确切的证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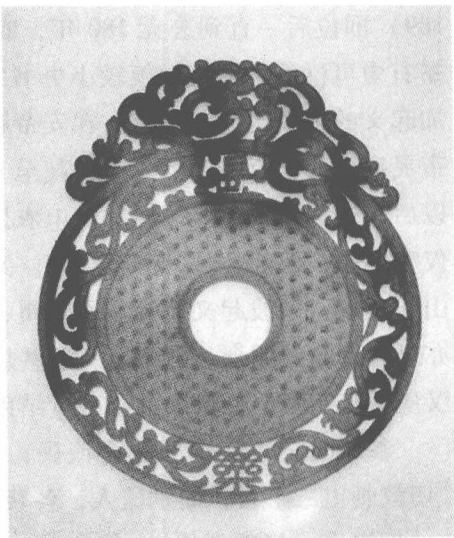


三、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

小生产者——农民与手工业者，是两汉帝国的主要军事力量。他们在汉帝国发展的整个时期里，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士卒尽家人子，起田中从军”（《汉书·冯唐传》）。当兵的是他们，负担国家捐税的也是他们。现在，他们的经济益趋衰颓了，他们的破产也就给汉帝国的军事威力带来了衰落。由于小生产者经济的衰颓和军事威力的衰落，东汉帝国在与其四周部族所进行的战争，也不得不由进攻转为防御，乌桓人与鲜卑人的进攻遂日益频繁起来。至此，东汉帝国对属国的统治已经动摇了。东汉帝国为了挽救它军事上的颓势，不得不用属国羌夷、附塞匈奴，把他们拼拼凑凑，来替东汉帝国作战。结果，却给东汉帝国招致了板楯七姓（即賁人）与南郡蛮等的反抗，以及酿成历史上有名的“羌患”，并给以后两晋时代的“种族大移动”埋下导火线。

东汉帝国内部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和激化，不仅体现在农民对封建阶级的动摇，还反映在统治集团内部。在中央，士夫与外戚、宦官的斗争激烈展开；在州郡，刺史、太守擅兵的割据条件也逐渐形成。

外戚、宦官是专制主义政权形式下的必然产物，因为唯有在专制主义政权形式之下，皇帝的亲姻才能依缘着裙带关系，掌握国家大政，同时那些受过阉割的宦官们，才有进入宫廷侍候皇帝从而操纵政权的可能。但是当专制主义的全盛时代，这一类人物，是不可能扮演当时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的。只有当统治政权腐化、国内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之际，即当统治集团上层不但恐惧农民革命运动，而且在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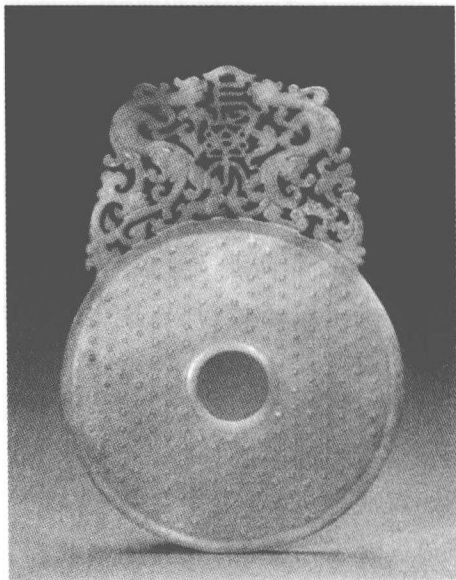


治阶级内部对自己的任何臣属也不敢十分相信的时候，外戚、宦官才成了统治政权里的主要角色。

东汉的外戚，本来都是贵族，窦氏是光武时功臣窦融之后；邓氏是邓禹之后；耿氏是耿况之后；梁氏是梁统之后。他们虽多出身于贵族，但是他们的势力却是随着皇帝的生死而转移的，即当新皇帝即位后，就有新的外戚要取得政权，而旧的外戚由于和新皇帝的关系较为疏远，他们就不伴随着旧皇帝的死去而失势。不过旧外戚是不肯甘心的，他们还会留恋权势而做垂死的挣扎。新皇帝长大之后，为了要还政于己，还须运用各方面的力量来铲除它。可是皇帝生长于深宫之中，要想消灭久秉大政、威势熏灼的旧外戚，没有机会和可能谋之于外廷群臣，这样，势不得不谋之于宫廷中亲近的家奴——宦官。故和帝利用宦官郑众杀窦宪（92）；顺帝利用宦官孙程等十九人杀阎显（125）；桓帝利用宦官单超等五人杀梁冀（159）。梁冀消灭之后，汉帝国的统治大权，也都落到宦官集团的手里去了。

不论是外戚，或是宦官，他们都是剥削人民霸占土地的能手。如外戚梁冀秉政十九年（140—159），他搜括四方物资，“充积藏室”；并封禁洛阳城西土地数十里，作为他的园苑；又强迫良民作债务奴隶，称为“自卖人”，有数千口人之多。他失败自杀后，政府没收他的财产，合三十多万万钱，占帝国政府全盛时期全年总收入的四分之一。这三十多万万，还不包括房屋和土地，绝大部分都是从人民头上强取豪夺来的。

宦官的贪虐横暴，比起外戚来更厉害。如宦官侯览“前后请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顷，起立第宅十有六区”（《后汉书·宦者列传·侯览传》）。“京畿诸郡数百万膏腴美





曹操传

CAOCAOZHUAN

田”，皆为宦官张让等所霸占（《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注引《典略》）。他们甚至“虏夺良人，妻略妇子”（《后汉书·宦者列传·侯览传》）。他们夺占全国大半土地的结果，是使农民失去土地变成赤贫，甚至沦为“自卖人”（债务奴隶），农民起义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展到全国范围的。

汉帝国的官僚机构规模巨大，且复杂，其中士大夫这一阶层，是官僚机构组成骨干。这些士大夫，他们往往先从师受经传，游学全国文化中心洛阳之太学（太学生是士大夫官僚的后备军），然后应命征辟，历任中央地方郎吏牧守，以至卿相高位，逐渐形成为世家望族。尽管客观上他们的庄园经济的发展，对帝国的统一起一种瓦解的作用，但是他们主观上是主张加强专制主义政权力量的。因为只有强有力的专制主义集权的中央政府，才能限制外戚势力的无限发展，才能使他们本阶层前进的路上没有障碍。所以当外戚势力发展的时候，他们是主张“权去外戚，政归国家”（《后汉书·李固列传》）。如外戚窦宪势力恶化的时候，士大夫涿郡崔骃、汝南袁安与之抗争；外戚耿宝、阎显势力恶化的时候，弘农杨震与之抗争；外戚梁冀势力恶化的时候，汉中李固、犍为张纲与之抗争。到了外戚势力消灭，宦官势力抬头之后，社会危机更是严重，士大夫和他们的后备军太学生们就投入了反宦官的斗争。由于三万多太学生，其中一部分比较接近下层，因此他们对政治的改良要求，也尚能取得广大人民的支持，以致引起了宦官集团的恐惧，终于酿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公元166年、169年两次“党祸”的结果，几乎把当时统治阶级内部较能关心民瘼，而主张对农民略有让步以巩固统治权的所谓“清流”——士大夫，一网打尽。

两次“党祸”发动以后，一直到公元189年，前后二十三年间，可说是宦官势力的极盛时期。中央各衙门，概由宦官来担任令丞，中官领禁兵，且成为“汉家故事”。宦官的“父子兄弟”，不但“并据州郡”（《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注引《典略》）当刺史太守，甚至有至官三公的。曹操的父亲曹嵩，就是在这一时期以宦官子弟的身分，累官至司隶校尉、大司农、大鸿胪、太尉的。

宦官擅政之后，汉帝国政治的腐败更达极点。灵帝时（178），致公开

在“西园”卖官，公千万，卿五百万；地方官，郡守二千万，令四百万。曹操父亲曹嵩取得太尉，就是向“西园”缴钱一万万才买到这官位的。

黄巾大起义爆发了，东汉政府为了集中统治集团力量来镇压农民运动，不得不下令解除“党锢”之禁，并起用党人皇甫嵩等镇压农民起义。从士大夫阶级的本身利益来说，为了共同对付更可怕的敌人起见，也是非参加政府并组织地主武装来“镇压”农民起义不可。何况他们还想在镇压农民运动的过程中，出任地方州牧刺史郡守，积蓄力量，形成一种割据的势力，以便等待时机，最后一举扑灭宦官的势力，进而分裂汉室、一统江山。

本来，汉帝国的地方政府是郡、县两级制，虽设立刺史，只是一种监察的官吏，而不是行政的官吏，后来才渐渐由监察官变为地方行政官，“州”也由监察区域渐渐变成行政的区域。这样，中央与郡县之间，又多了州牧或刺史一级，地方政府就变成州郡县三级制度了。

这州郡县的三级制度，影响魏晋南北朝的政制极为巨大，一直到隋朝，才加以厘革，重新恢复为州县或郡县的两级制度。

西汉初期，只有边郡的太守才许统兵，所谓“初置四郡，以通西域……保边塞，以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所以程不识、李广“俱以边太守、将军屯”。东汉自安帝顺帝以后，“羌患”遍及内地，农民运动也发展到全国范围。由于军事的延续和扩大，刺史、太守主兵，遂由沿边州郡延至腹地。刺史太守既握有军民财政诸权，地方政府的势力开始重要起来。到了黄巾起义爆发后，中央权力薄弱，对州郡不能控制，割据局面遂由刺史守相的擅兵而形成。

四、宦官集团的覆灭与董卓入京

当黄巾大起义爆发时，东汉政府想组织一支新军，来加强保卫首都的力量，在“西园”成立统帅部，因此这一支新军称为西园八校尉。以宦官蹇硕为上军校尉，连大将军也都得受他指挥，实际上成为全国的最高统帅。这一支新军中，又有“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的士大夫地主集



曹操传

CAOCAOZHUAN

团核心人物袁绍任中军校尉，也就是副统帅。当时士大夫地主集团中突出的人物很多，之所以叫袁绍来担任这一角色，是由于袁氏曾和宦官袁赦攀过本家，和宦官集团比较靠拢的缘故。

灵帝死后，外戚何进（少帝舅）任政，袁绍劝说何进，诛宦官。进杀蹇硕，取得了西园八校尉的指挥权，又想彻底消灭宦官集团，而进姊何太后不答应。进乃召董卓于并州，准备在董卓军队开进洛阳之后，立即解决宦官。宦官段珪等先发制人，杀何进，劫少帝出走。袁绍勒兵反攻，悉诛宦官凡二千余人。

宦官的势力虽彻底消灭，董卓的军队却开进了洛阳。这样，东汉帝国的大权又落进董卓的手里去了。

董卓是西北国防军的首脑，他的军队构成成分，除了汉人以外，还杂有羌胡族的雇佣兵，纪律非常坏。进入洛阳之后，他的兵士“淫略妇女，剽虏资物”。有一次派兵去阳城（河南登封县），正是春季祭社的日子，卓军突然把人民包围起来，男子头全数割下，挂在车辕和车轴上，载妇女财物，歌呼回到洛阳，声称击“贼”大胜。

董卓擅政之后，杀何太后，废何太后子少帝，立少帝弟协为皇帝（献帝），自称相国。

董卓对拉拢士大夫地主的工作也做得非常不好，以致失去了他们的支持。当时袁氏的势力，“门生故吏，遍于天下”，消灭宦官时，袁绍又出了大力。可是董卓与袁绍发生了摩擦，逼得袁绍逃出洛阳，



投奔河北。卓又尽诛袁氏家属，于是关东（潼关以东）州郡，纷纷起兵，推袁绍为盟主，共同声讨董卓。

董卓看着洛阳受到关东军威胁，而黄巾余部郭太这时又起义于西河之白波谷（在山西临汾县），人数已发展到十多万，有渡河截断董卓后路的可能。于是他匆忙地挟了汉献帝退至西北军的根据地长安。董卓入关之后，“又稍诛关中旧族，陷以叛逆”，更弄得统治阶级内部上下离心，人人自危。司徒王允联络董卓部将吕布等共杀董卓，并其宗族。董卓死后，董卓部将李傕、郭汜等，收集残部，攻破长安，杀王允，关中大乱。

五、军阀混战

西北军与关东军混战的过程中，董卓撤出洛阳时，火烧洛阳，“城内扫地殆尽”，洛阳周围数百里内城市村庄，都被烧得精光。董卓驱洛阳人口数百万入关中，这数百万人民，在路上，饥饿困顿，积尸满路。

董卓退至长安时，长安几百里内，尚有人口数十万。董卓死后，其部将李傕、郭汜攻破长安，接着催、汜又互相攻击，纵兵掠夺四十余天，长安成为空城。谷一斛，价至五十万文，豆麦一斛，价至二十万文。史称：“人相食啖，白骨盈积，残骸余肉，臭秽道路。”关中全境，遭到这次灾难，人民死亡逃散，二三年间，“无复人迹”。

关东州牧守相，起兵讨董卓，军于荥阳，纵兵抄掠人民，人民死伤很多。后来又互相攻击起来，正如《三国志·魏志·文帝纪》注引《典论》自叙中所说：“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飘扬云会，万里相赴。……山东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以还相吞灭。”大抵当时最富庶的地方，也就是战争最激烈的地方，如陈留、颍川两郡，《续汉书·郡国志》：陈留户十七万七千，口八十六万九千；颍川户二十六万三千，口百四十三万六千，都被杀掠一空。颍川郡属县鄢陵（河南鄢陵县），旧有民户五、六万家，经过战火浩劫之后，只剩下数百民户，古代世界人口集中的黄河流域，造成了“千里无人烟”与“白骨蔽平原”的悲惨世界。

随着东汉帝国崩溃而来的，是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生产组织也被破